

运河文化之“气”论

谢光前

(江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启动,昭示着绵延2500年的中国大运河凤凰涅槃将以文化形态走向未来。在漫长的时空流转过程中,运河之“气”遍行全域,就其已然的历史气韵看,大运河存霸气、现王气,蓄财气、聚人气,通仙气,立骨气,接地气,带俗气。运河是国家统一的干道,经济繁荣的血脉,城镇兴盛的滋养,百姓栖息的家园。当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展开,既是为激发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也能够显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性价值的志气。文化带建设肩负着保护历史遗存、涵养生态环境、丰富旅游资源的重任,需要全社会勠力同心养其秀气,创其灵气,同时谨防在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妖气与邪气,即借文化建设之名行伤害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之事。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其要义在养天地浩然之正气,强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根本旨归。

[关键词] “气”; 运河文化; 历史气韵; 当代气象; 浩然正气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3-0047-08

一、中国文化之“气”的发散

运河为水,何以有“气”?《国语·周语下》言:“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疏为川谷,以导其气。”^[1]《国语》所表达的内容,已然表明水与气实则相通。在中国文化的长流中,对“气”的素朴认知在文字初现时就有显现,有意思的是,“气”在甲骨文中的形象与“川”字相比较,一个是横卧为“三”,一个是直立为“山”,只是有金文之时,“三”才渐变为“𠄎”和“𠄐”。据于省吾的考证,甲骨文的“气”有“乞求”的意思,而古代文字学家许慎、段玉裁均认为,“气”的本意是指充盈天地之间的云气,“气,云气也,象形。”(许慎:《说文解字·气部》)“象云起之貌,三之者,列多不过三之意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先秦之时,“气”意已显得驳杂多变,或实描、或化生、或内隐、或放达,林林总总。日常生活、天文地理、风水身体、医术药理,诗文技艺、庭院建筑、儒道要义等等,一如实在之“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今天我们说“空气”,其实这“气”并非空,而是由不同分子组成的世界,但有空便有“气”。中国文化之“气”遍布天地人间,四周弥漫,由“气”发散开去,具象与抽象、实物与精神、知与行、情与志等等可以描述、抑或不可言说的存在都有“气”的入侵。所以,“气”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根主线,舍此恐难以真正全面释读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学界对此论述颇丰,就哲学层面而言,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的“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庄子·知北游》),王充的气一元论,到张载、王夫之有关“气”的思想,一直到五四前期,气论一直贯穿在中国哲学的主体研究范畴之间,直到新文化运动,由于胡适、陈独秀等对“气”论的反驳,此后哲学之“气”便烟消云散。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气”的研究曾经因为“气功热”有过复苏的迹象,但是终究因气功的走火入魔,气论被贴上了“伪科学”的标签而彻底沦陷,不过本文所论旨不在此,故不详述。

运河乃中国历史演进中发挥独特功能并起着重大作用的水利工程。若从夫差开邗沟作为始点,已有2500年的时光。运河几经变迁,它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走向。当下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引发的“运河热”,多以历史的视角看运河,而史家说河则更多是以客观叙事以证其利害,这固然是求证运河价值的理据,不过,就更进一步丰富运河文化的内涵而言,还需要对运河蕴含的意义作更充分的阐释。以“气”释河,不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江南文化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课题(JUSRP12095)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谢光前(1963—),男,江西信丰人,江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

只是因《国语》中“川、气之导也”的启发,更因在 2500 年间,运河之“气”遍行全流域,值得凝练与汇聚,且又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启动,使大运河凤凰涅槃将以文化形态昭示其走向未来的时代,“气”说运河,也算是理解运河文化价值的另一个视角。一家之言,一孔之见,求教方家。

二、运河文化的历史气韵

运河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中,并不是仅仅是一条流动的线性的河流,当它的存在密切关系到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时,它的复杂性无论是在初始的动因、抑或本体的变迁、功能的延展等方面都将得到充分体现,因而运河所积聚的历史气韵是丰富、深厚、驳杂的。本文从四方面具体概述。

1. 存霸气、现王气

开凿运河之风始于春秋战国那个纷乱的时代,诸侯争霸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各诸侯国皆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人力资源或保全自己或称霸一方。在古代的战争环境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举,但这并非易事,非常难得,因而,在需要通过人力杀戮去获得胜利的战争中,利用便利的通道,实施快捷的行动往往是取胜的关键,所谓“兵贵神速”是一大法宝。拥有充沛水利资源的江南诸侯各国是比较早懂得利用水的优势来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当时南方的楚国、吴国、越国等都曾经借由水道运兵输粮,众所周知的邗沟就是吴国为了北上称霸开凿的,实际上,吴楚相争,吴越相斗,也曾经有为了达到快捷制胜的目的而挖沟凿河的记载,楚国曾经开挖巢肥运河、荆汉运河,吴国在夫差开邗沟之前,阖闾王曾经命伍子胥开通了由太湖经宜兴、高淳到达芜湖的水道——胥溪,并且利用这一通道快捷运输兵粮,赢得伐楚之战的胜利。越国开蠡河与通江陵道,为灭吴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越王闻吴王伐齐,使范蠡、洩庸率师屯海通江,以绝吴路转袭吴。”^[2]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早期繁衍生息的聚集地,在烽火四起、狼烟弥漫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水网尽管不似南方那么发达,但是北方诸侯各国利用水力寻求在战争中获得有利地位的并不鲜见,史载典型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期间利用“郑国渠”滋养秦国属地,使之丰饶富足,从而能够兵强马壮,一统天下。期间魏惠王也曾经完善了鸿沟水系,并且试图据此称霸中原。可以看出,早期运河的开凿,大多具有杀伐之气,服务于战争与军事目的,一直到楚汉相争、三国鼎立时期,运河作用于战争的需要非常明显。如刘邦与项羽激战于鸿沟、曹魏取得官渡大捷,都是与运河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见,运河流域“霸气”激荡,这是初始阶段运河开凿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说运河在春秋战国以及两汉时期遗存的是“霸气”,那么在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贯通南北之后,河中流淌的更多是“王气”。隋文帝统一国家建立了隋王朝,结束了五胡乱华以来长达 400 余年纷乱的历史。在隋文帝统治的十多年时间里,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为隋炀帝贯通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因为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不恤民生而导致隋朝成了短命的朝代,但其留下的运河却成为后代帝王倍加重视的宝贵遗产。唐宋元明清在各自盛世的时期,为了巩固王权,维护国家统一,皆视运河为国家的生命线,因而使得这条古代中国道路的命脉充满了“王气”。在大唐盛世,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到唐玄宗,都念念不忘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早在隋末群雄并起争夺统一大业时,“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对漕运和漕仓的利用就远胜其他群雄。……把漕运线维护的很好,以关中为根据地,向东稳打稳扎,逐渐削平群雄。”^[3]可想而知他们对运河的重视。而高宗与武则天更是多次行幸运河重镇——东都洛阳,高度关注运河粮道的通畅与否。武则天称帝时,发现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河道拥堵非常严重,于是,武周大足元年(公元 701 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4]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量,保证运河的通畅都是几代帝王的头等大事。宋代也是如此,宋太祖与宋太宗曾经为了运河事务殚心积虑,宋太祖立国之时把运河通漕最为便利的中心——汴京作为国都,这表明他极为清楚国之生息仰仗此河。《宋史》则记载有宋太宗为解决运河因为决堤出现淤堵急需疏通,自己身先士卒入泥淖排淤的故事,为运河的通畅与否而牵肠挂肚。元代忽必烈让郭守敬规划并且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其中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也可见出生大草原、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一代君王的良苦用心。至于康乾盛世时期的康熙与乾隆各自六下江南,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河工,巡察运河是否能够安然运转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实际上,他们南下的路径基本上是沿着运河而行的,因而在运河诸多城市都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所以,帝王之气是否显赫,往往与运河之通是相关的。

大运河中存在的“霸气”与“王气”,并不是帝王因为对运河本身充满感情而割舍不下,而是因为他们真正理解运河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无论为“霸权”还是为“王权”,都说明“国之生息仰仗此河”,所谓“运河

兴则国运兴”其实是盛世时代的帝王对运河与国家关系的洞察。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时期运河的开凿或者疏浚都包含了不同时期帝王的苦心。

2. 蓄财气、聚人气

在运河历史的研究中,一直以来对漕运的关注是一个焦点,“漕运线是生命线”的论点得到确认。这主要是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尤为明显。如前所述,早期运河是为了称霸而开凿,隋唐南北运河贯通则更多是为了漕运以保障对维护国家政权的供给,正是由于漕运的不断发达,也激发了运河沿线其他行业与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形成了运河“水到渠成,财源滚滚”的局面,正如《通州志》所述:“半天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漕运的发达使财赋成为维护王权统治的重要手段,而产业与商业的发达则使民间的社会财富得到了迅速增长,就以唐朝为例,所谓大唐盛世并不只是以朝廷有着丰厚的财赋为标志,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中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藏富于民”。在安史之乱前,国家的安定和运河的通畅,为百业俱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人家储粮,皆在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见计量。”^[5]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数量惊人。杜甫曾经描写过当时的情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二》)另外,从漕粮运送的数量节节高升的情况也可见一斑。唐初,漕粮的年运量在二十万石,武则天时期达到四十万石,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则飙升到二百万石以上,《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云:“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宋代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宋初“漕事尚简”,漕运量不多,但是到英宗、神宗时期明显增加,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漕金帛缗钱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宋史·食货志》)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叠加,它反映的是运河贯通后借由于这一通道使国家的财税得到了快速集聚。与此同时,民间的资财也得到了丰富,在产业(丝、茶、棉、盐、瓷、铁、船等等)发展与流通过程中,百姓也或多或少能够得到一定的实惠,如此才有可能“人家储粮,皆在数岁”。即使是遭遇灾荒之年,也能够通过漕运比较及时赈济灾民,《玄宗纪》记载:“开元十五年(727),……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之。”(《旧唐书》卷8)另有记载说在开元十六年“顷者水灾,荐及河朔。思无不至,忧彼元元,发仓廩漕江淮以赈之,蠲租税、停征役以安之。”^[6]由此可见,运河的开通对于财源的积蓄是发生着极其重要作用的。

从宏观的历史流变意义上看,大运河改变了大半个中国的空间肌理,营造了一系列新的可供人们生息的场域。在自然状态下,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宽阔的水道是阻隔人们走南闯北活动的天然屏障,人们的日常生息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中。而南北运河沟通五大水系之后,运河的流动不仅带动了物产的流动,也因此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人们聚落的场所日益增加,村落、集镇、城市依水而兴,人口在流动中聚集,运河沿线的“人气”飙升。仍然以唐朝为例,杭州在唐朝初年,城区只有一万五千余户人家,而到了宪宗时期增加到十万多户,在一百多年里增加了近10倍,增速罕见,以至杭州呈现出了“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热闹景象。苏州也是如此,隋朝它只有一万八千余户,到了唐元和年间则达到了十多万户,所以吴融有诗叹道:“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7]杜荀鹤《送人游吴》则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8]可见姑苏民生充裕,安居乐业。在唐天宝元年,全国各县平均增长户数为五千七百户,而运河交通极为便利的三吴四郡则平均增加了一万六千多户,润州丹阳达到二万五千户,常州晋陵郡达二万零五百户,说明在运河沿线的城市,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力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强大。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人口的迅速集聚,除了其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富庶等因素外,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交通的便捷,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人口密集的主要原因。

3. 通仙气,立骨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为其三根支柱。儒学关心家国天下,道家追求自然超脱,佛教是舶来品,期盼万物圆融。在运河的逝水流波中,儒道佛都在运河两岸留下了自己的寓所,书院、道观、庙宇各自安家,一大批儒士、真人、高僧在其间印刻下深深的足迹。还有诸如水仙、妈祖等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在烟雾缭绕、众生膜拜中扎根。

儒学的发端与传播基本是围绕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展开,笔者曾经撰文对其有比较详细的描述^[9],兹不赘叙。自隋唐始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书院,藏经集典、讲儒问道、燕饮诗酒,招贤纳士是书院基本的功能。

有意思的是,据说唐玄宗时,还真将仙异之人张果(后来演绎为“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召至东都洛阳的集贤书院,令其居住院中,封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10]45}。另外一件有趣的事也值得一提,北宋时期常州郡守李余庆在常州城开了一条运河支脉,称之为“后河”,开河之时他预言,“自此文风浸盛,士人相继高科,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龙图阁直学士邹浩撰《开后河遗事》说:“河成未几,学者果然盛……钟聚秀气,世有名。”陆游也撰《开后河记》认为,“后河成废,与士之举有司者相与盛衰亦自有理。”^[11]当然,张果入书院只是个案,后河的兴建与士人盛兴的关系也可能是巧合,但儒家是把“修身养性”“家国天下”作为使命与担当,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于成就功业也是重要的。在唐宋的诗词中,描述书院中清风仙气的诗文甚多,唐代诗人吕温有诗说书院:“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12]聚贤书院副知院事张九龄说过:“集贤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圣,而犹垂意好学。……及乎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13]而后为了去华务实,便将“仙”改为“贤”。范仲淹作《南京书院题名记》也写到:书院“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10]84}

道家与道教在运河流域的踪迹同样明显,老子与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源头就在运河岸边,老子是春秋晚期陈(后入楚)国苦县人,即今天的河南省周口的鹿邑县,庄子则是宋国蒙人,与老子相距不远,是今天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一带,这些地方的水域与运河都有一定的关联,或者为运河提供水源,或者直接就是运河流经之地。后来的道教虽然喜好安身立命之处更多选择在丛林幽谷之间,但是在大运河的两岸,仙风道骨之气依然非常浓重,道教的洞天福地分布各地。在隋唐时期,洛阳、润州、苏州、杭州等地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道场,洞天福地不仅是仙人道士传扬道义的场所,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江西的万寿宫为例,看上去江西与南北大运河的关系甚远,但是在大运河的沿线城市,如明代的北京、杭州、扬州、天津等地方都曾经存在过万寿宫,而万寿宫正是道教所列的七十二福地中的“飞升福地”。江右商人在走南闯北经营生意的过程中,就是利用万寿宫这个吉祥的福地聚集在一起,一方面祭祀“福主”许逊(许真君),另一方面祈求健康平安、生意兴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西域还是从沿海进入中国内地,所走的线路基本是在运河沿线,且不说佛教对于古代中国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就从一系列运河城市留下诸多古庙名刹就可以见证佛教在运河沿线的兴盛,洛阳白马寺、嵩山少林寺、开封相国寺、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无锡南禅寺、苏州寒山寺、杭州灵隐寺等等,都是声名遐迩、信众群朝的古庙。佛教在中国的两汉南北朝、隋唐、明清时期能够迅速而广泛得多传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运河的畅通。鉴真6次东渡日本,在国内所以经过的线路就是运河沿线的扬州、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等地,沿途他讲法传教,使佛教在运河沿线日益盛隆。^[14]其实,在大运河沿线还有众多的高僧大德在传播佛教的过程中演绎了无数的佳话。

儒道佛在运河沿线的扎根为他们各自的传扬光大创设了广阔的空间,如果说他们是整体意义得以香火接续、仙气缭绕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史上几位大仙在运河地域的行走则增添了这一通道的神奇。

李白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实际上,在开元26年到27年间,李白开启长达一年的运河之旅,他从宋城开始,经泗水、邳沟、江南运河达到杭州,一路青山秀水、名胜古迹,在运河两岸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槽,中流鹅鹳鸣。云天扫空碧,川岳涵徐清。飞舄从西来,适与佳兴并。”(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运河的通达,一代诗仙要游走大江南北、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也是困难的。

白居易与运河的渊源关系极深,他曾经在徐州长期居住,对水与人关系的认知鞭辟入里,他曾立下去杭州治水安民的宣言:“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又写下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这一不朽的千古诗篇。不仅如此,他治水理水的贡献也为后人称道,西湖的白堤固然是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苏州的山塘河则是白居易直接规划指挥开凿的运河支脉,“唐白公居易来守是州,始凿渠以通南北而达于运河,由是南行北上无所不便。”^[15]这条支河的开凿成就了山塘街的繁华,也成就了姑苏的荣光。

苏东坡与运河的情缘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为官几起几落,在运河城市汴京(开封)、徐州、杭州、扬州、苏州、常州、宿州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诗篇,而且还终老运河城市毗陵(常州)。在运河沿线,苏东坡既为一方水土勤政操持,也在山水之间寻求寄托填词歌吟,展现一代天骄的旷世奇才。在徐州,他写道:“为

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苏东坡：《江城子·别徐州》）他赴扬州任职，写下《淮上早发》：“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等等。苏东坡在运河两岸不仅是啸风吟月，言志抒怀，他也为治理运河贡献力量，在杭州，“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见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刍，亦缘此暴贵，寻刷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得千余人，自十月兴工，至今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今公私舟船通利。”^[16]他还有《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表达治水理水的情怀：“居官不任事，萧散羨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识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他晚年抱病乘一叶扁舟经运河来到常州时，不由慨叹“快风活水，一洗病滞……”，由此实现了自己“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楚颂帖》）的夙愿。

当然，游走在运河流域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难以尽述，他们在运河两岸留下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诗文，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不过，李白、白居易、苏东坡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巨擘。在运河两岸，他们看似仙游，但也是感慨良多，而且还试图治理运河有利于民一展抱负。我们所谓的仙气并不是来自隐居深山的世外高人，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来既超凡脱俗，又关爱苍生世界的精神气质，显然，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都拥有这样的情怀，同时也努力在付诸行动。在一定意义上看，正是在山水之间游走的过程才不断丰富着他们的才情，开阔了他们的胸怀，运河则是为他们在不同的空间抒怀唱咏开辟了通道。

同样值得铭记的是，如果把运河视为连接五大水系的脊柱，那么运河水的滋润还植立了古代中国众多侠义先贤的傲人骨气。先秦时期，在运河区域无论是冀北燕赵还是江南吴越，在春秋战国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都曾经出现过为家国天下慷慨赴难的侠义壮士，如荆轲、专诸之辈，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可谓是千古绝唱。而众所周知的在魏晋时涌现的建安风骨与竹林七贤，则为天下文人志士注入了一种独特的血气。曹氏父子的雄健激越、慷慨悲怆的风格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至深至远，那种“对酒当歌”的文人豪迈之气历久弥新；竹林七贤的落拓不羁、率性而为，其中的嵇康、刘伶、阮籍更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乘自然之风，立人文之骨，为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树起了特异的丰碑。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的流经之地是富庶丰饶充满温情的柔媚之乡，傲骨挺立似乎与此地很难扯上关系，然而，事实上江南风骨在华夏大地上是独树一帜的。范仲淹表达与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仁人志士应有的节操；东林书院悬挂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一代名士的担当与理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国家危难之时激荡中华儿女的铁骨铮言。在近现代风云变幻的时光流转中，秋瑾、鲁迅、马寅初等等一大批从运河河畔走向社会大舞台所表现出的凛然傲骨，可謂是气贯长虹，撼天动地！

4. 接地气，带俗气

运河贯通对于国家是一条生命线，对运河人家而言，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呈现丰富多彩的通道与场域，节庆礼仪、婚丧嫁娶、吃喝拉撒、玩乐嬉戏等等都可以围绕运河展开，又由于各地运河环境的特点不一，造就出每个地方颇具个性的生活形态，这些世俗生活样式通过运河相互流传交融。世俗生活既接地气，又带俗气，因而使得以大运河为轴展开的百姓生活充满鲜活的魅力。

描写运河世俗生活极为生动的早期作品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原始文献资料，它们再现了宋代都城开封与杭州运河两岸的场景，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类典籍中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东京梦华录》是南宋初年孟元老所著，他深切怀念北宋晚期在汴梁生活的时光，在书中他不仅描绘了当时开封的城市格局，还具体介绍了运河的河道、桥梁、码头及其周边的街道、寺庙、酒楼、勾栏瓦肆等，更对与之相关的饮食美味、技艺娱乐、庙会活动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比如他在“州桥夜市”中谈到，“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玉楼前，獐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臾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17]一片活色生香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氛围。又如《梦粱录》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

徽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18]当时的店铺酒肆以及市场多在桥头河边,其原因不言自明,这样既方便食客往来,也为了店主买进货物材料更加便利。在周密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撰写的《武林旧事》中,则对传统农历自立春到除夕的各个重要节日进行了生动刻画,同时对其中的各色人物以及各种活动的礼俗、步骤、场景等等也有细致的描绘,从中可以看到运河人家的生活地气与俗气的融合。其他的文学作品如《金瓶梅》《三言两拍》《红楼梦》等等,都有许多反映运河沿线贵族与百姓生活的描写。《红楼梦》固然是反映贵族生活的一部经典,但其中的人间烟火之气也是特别浓郁,《金瓶梅》中有关饮食男女的叙事入木三分,各种人情世故充满俗气。而这也正是因为运河的通达带来的繁荣为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经营自己的生活空间创造了条件。

所以,理解大运河的意义,漕运对于国家兴旺具有生命线的价值固然是极其重要的,但同样在关涉生活在两岸的运河人家的具体日常来说,运河的存在是他们栖息其中感受或体验生命意义的重要通道,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各类大典,大凡与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相关联的问题,运河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都可能存在,可以说,运河以其特有的功能影响了运河人家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大运河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如若运河通达,诸“气”相互激荡与聚集,便能够成就一个朝代的荣耀与辉煌,而若运河淤塞或冷落,一个朝代就可能出现衰败之虞,正所谓“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也印证了河运和家国天下的命运相关联的道理。

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时代气象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大变局中,运河长期因被冷遇而逐渐丧失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形成,运河的运输功能退化,导致其日趋沉寂。在经过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艰苦卓绝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奋斗,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到今天的强起来,需要培根固本,追寻民族的文化基因,强健民族的文化根脉。而大运河积蓄的丰厚价值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在其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与确立。当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既托底气、长志气,又养秀气、现灵气的伟大事业,在实现民族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中,也应当防邪气、避妖气,以确保运河的千年神韵绵延不绝。

1. 托底气,长志气

在以大运河为主体而云聚的文化气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化在 2500 年所涵养的深厚的底蕴。中华文明 5000 年,有一半的历史是运河与之相伴同行。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在风云跌宕中变幻更迭、起落,但是不同朝代皆视运河为不可忽视的国脉。如前所述,运河对不同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程技术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诸多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标识都与运河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故宫,苏州园林、丝绸之路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遗产的产生过程及影响力的辐射,如果离开了大运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难以理解的。以故宫为例,这个宏大的皇家建筑群,其建筑中所用的砖木瓦石有许多是取材于南方,然后通过运河运往北京。而整个故宫的建筑风格与特色的形成则是来自运河之畔——苏州的设计家蒯祥(1397—1481)的杰作。又如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在古代对外交流往来的中轴则是大运河。所以,当年(2014)丝绸之路与中国大运河同时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看似巧合,实质是历史的机缘。

大运河凸显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之林的内在底气,这是在当代我们把“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必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基本理路,也是彰显文化自信、民族志气的客观依据。虽然中国大运河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不过才短短的六年,但在人类开凿运河的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所承载的厚重的物态与精神价值是世界上其他运河不可比拟的。从与先前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外运河比较来看,法国的米迪运河(1996 年入选)、加拿大的里多运河(2007 年入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区(2010 年入选)等无论是从开凿的时间、规模、流程、工程艰巨性各方面都与中国大运河有一定的差距。当 2014 年中国大运河在卡塔尔的多哈会议表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这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是国人同样可以引以为自豪,这证明中国古代所创造的工程奇迹是人类文明耀眼的瑰宝!

2. 养秀气,显灵气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目标,不仅是建设继古开今的璀璨文化带,而且是要建设山水秀丽的绿色生态带和享誉中外的缤纷旅游带。因此,治水理水是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中之重,运河只有还原清气氤氲,方能激发灵秀之气而滋养生民,进行让人们徜徉在古朴的历史与灵秀的现代之间体验流动的运河那瑰丽的神韵。

客观地说,大运河在近现代近百年的历史中是沉寂的,自从晚清漕运被废止后,运河或者被堵塞、或者被填埋、或者被污染。从现实看,大运河水体状况不容乐观。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承载着水生态恢复的重任。周琪认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与‘美丽中国’建设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利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治理,充分展现运河船舶穿梭之美,活水清水灵动之美,堤岸绿影婆娑之美,流域田园风光之美,建设令人向往的宜居福地、美丽家园。”^[19]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也描绘了“美丽运河”的蓝图,即“将大运河打造成河湖岸线功有序、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环境绿色宜居、城乡建设特色突出、山木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相得益彰的‘美丽运河’。”^[20]可见,运河魅力的呈现不只是让人们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中怀古思幽,当代人赋予其超越历史而达到新的境界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质是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努力合奏出一曲恢弘的历史、人文与山水相互辉映的现代交响。

3. 防邪气,避妖气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历史 2500 年的沧桑巨变,但是也有人因为运河曾经带来的灾难而彻底否认其历史价值。就此而论,涉及到一个看待历史遗存或事件的方法论问题需要辨析,在整体与个体之间,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其价值和意义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两极。大运河在开凿期间,隋炀帝曾经劳民伤财,对当时的百姓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不同时期的黄淮泛滥经过运河也给两岸的生灵也带来过灾难,但是如果仅仅以局部或者个体的现象而忽视运河整体的意义是有失公允的。夸大运河的负面影响进而否认其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巨大作用是一种“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其实,就黄泛之害来说,即使没有运河,黄河泛滥依然会引发灾难,只是可能发生的地点不同而已。所以,把运河妖魔化的认识应当摒弃。

而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还必须防范邪气的滋生,就是利用文化建设搞大开发,从而破坏宝贵的历史遗产。在过往的建设大潮中有过不少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仅就运河而言,除了自然的因素造成运河河道的堵塞、文化遗存的缺失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众多的宝贵遗存在漠然无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被人为糟蹋后变得体无完肤,这在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期间就曾经发生匪夷所思的案例,“2010 年 8 座宋元粮仓遗址被毁,给镇江大运河申遗造成了恶劣影响,”^[21]这直接导致镇江这个重要的运河古城被排除在运河申遗城市之外,而 8 座宋元粮仓遗址被毁的原因正是开发商在发现重要遗址的地块上兴建高楼大厦。前事不忘本应是后事之师,但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融入到国家整体的文化战略开启其新的征程之际,由于对运河文化的价值在理解上存在偏差,也出现了把保护传承运河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应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权衡利害关系,认为运河在当代的航运功能已经没有多大价值,在地理空间上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保护运河文化遏制了经济建设,因而在某些运河区域发生了在规划建设开发中严重破坏运河本体与遗存的状况。若果真如此,而当我们追寻民族的文化基因、探求历史的文化根脉时,那只有荒漠的虚空!

令人欣慰的是,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开启历史新征程之际,国家颁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推动出台大运河保护条例,整合各类执法资源,强化执法力量建设,依法查处各类违法事件,落实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估与遗产监测巡视制度。”^[20]此后,大运河沿线省市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而其中最具有法律意义的是江苏在 2019 年 11 月 9 日颁发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谋定而动,正气护航,标志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江苏率先迈入“法治之道”。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公丕祥教授认为,《决定》的颁布意味着我国有了第一部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法规,这在新时代江苏立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的意义,《决定》的实施是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利用法治思维保护好大运河文化的重大举措。并将为促进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地方保障^[2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国家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战略,涉及到历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当代与经济文化生态的关联性以及未来的可持续性等,只有建立完备的治理体系构建才能使其走向有序的轨道,而法治之道,则是杜绝妖、邪之气侵蚀运河的武器,是运河文化再现辉煌的根本保证。

四、保护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笔者曾经撰文认为,“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因为在其中蕴含了中华民族道法自然的智慧、百折不挠的斗志、创新包容的气度和汇通天下的理想^[23],这些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基本保证。在当代,“把一个什么样的大运河留给下一个千年,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22],“千年运

河”欲焕发时代风采,使其在中华大地依然“生生不息”,就必须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其要义在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杨海文先生对此有精要的阐释,他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气,它是最伟大、最刚强的,必须跟正义与道德配合在一起,气养浩然要求抚民以仁^[24]。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伟业,它的伟大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成为可以“诗意栖息”的美丽幸福家园,而其刚强之要则在于建成这一代表民族文化根脉的标识需要浩然正直之气度,顶天立地之精神。大运河与时光同行,在岁月中流变。虽然在它的年轮上镌刻的“漕运”印迹渐渐淡去,但它积蓄的文化气韵却依然生机勃勃。今天,我们追寻运河的历史并非为着还原历史,在当代建设运河文化带是为着拓展运河的文脉,成就绵延千百年的运河文化根系盘桓在大地、枝繁叶茂。在新时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要把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延展至更为宏大的空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旨在让大运河这条古代中国道路的主脉,从地理标识拓展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标识。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承载着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历史重任,流动的文化在联动的世界要激发更强劲的活力,就要有尊重历史的敬畏、遵循规律的理性、造福未来的担当,如此,才能成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间正道的伟大事业!

[参 考 文 献]

- [1] 左丘明. 国语·周语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吴文化研究促进会. 勾吴史集[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81.
- [3] 张晓东. 汉唐漕运与军事[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83.
- [4] 徐松. 河南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4:142.
- [5] 元结. 问进士[M]//元次山集:卷7.《四部丛刊》本.
- [6] 宋敏求. 处分朝集使敕[M]//唐大诏令集:卷104.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7] 吴融. 风雨吟[M]//全唐诗:卷687.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8] 杜荀鹤. 送人游吴[M]//全唐诗:卷691.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9] 谢光前. 儒学在运河区域的源起与传播[J]. 珠海潮,2019(1).
- [10]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 [11] 邵志强,张戡炜. 常州运河史话[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262—263.
- [12] 吕温. 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M]//全唐诗:卷370.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3] 张九龄. 曲江集:卷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6册:183.
- [14] 闫卫平. 佛教在大运河沿线的传播[N]. 中国文化报,2013-04-18.
- [15] 皇甫汈,等. 万历长洲县志[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 [16] 苏东坡. 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M]//苏东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六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 [17]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42—43.
- [18] 吴自牧. 梦梁录·观潮[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19] 周琪.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三个维度[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 [2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R]. 2019-02-01.
- [21] 林清智,胡玉梅. 无缘大运河申遗镇江人很失落[N]. 现代快报,2014-06-24.
- [22] 言省. 谋定而动,正气护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江苏迈入“法治之道”[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
- [23] 谢光前. 再议“生生不息”是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 [24] 杨海文. “浩然之气”与孟子的人格修养论[J]. 社会科学战线,2018(12).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60页)